

70

《贵阳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二十三辑

(抗战中贵阳文化活动)

目 录

抗战时期贵阳文艺活动片断·····	黄 炜 (1)
我在民教馆的回忆·····	伍静远 (12)
抗战时期贵阳的文艺活动点滴·····	钱安毅 (14)
抗战后期我与文化界人士的交往·····	李文昉 (18)
文化名人在贵阳的活动片断·····	彭晓珍 (22)

贵阳沙驼业余剧社·····	李黔宾 (24)
抗战时期贵阳的话剧活动·····	舒 明 (45)
山城剧坛人物简志·····	舒 明 (63)
令人难忘的往事	
——抗战后期贵阳文化活动·····	楚 石 (79)
在贵阳的半年·····	陶 然 (84)
抗战初期华生活剧社的抗日宣传活动·····	包 埴 (86)

记抗战时期的几次音乐演出活动·····	蓝泽众 (91)
抗战时期贵阳的音乐活动简况·····	魏 岩 (100)
一次激动人心的音乐会·····	赵秀宣 (104)

回忆“筑光”演出片断	宋鹏举 (106)
贵阳电影放映的回顾	崔金培 (108)
在贵阳街头作抗日宣传的民间艺人	
.....杨 林口述 蓝泽众、赵秀宣整理	(109)
欧少久与山城的“抗战相声”	甘咏衡 (111)
抗战时期贵阳的杂技艺术	陈泉生 (113)
贵阳图书文具行业概况	李建培 (119)
— • —	
贵阳中小学生掀起的一次抗日爱国活动	
.....孙礼和口述 宋德光记录整理	(129)
贵阳县职中在抗战时期的文艺活动	梅春煦 (134)
音乐教学十年	麦放明 (138)
回忆一次校园抗日歌咏活动	蒋治中 (143)
贵阳中学音乐戏剧活动琐记	旷国坚 (144)
战时中学唱战歌	邓时丽 (149)
贵州大学音乐社和大夏中学的音乐演奏会	石国梁 (151)
— • —	
贵阳社会服务处的文化活动	李 实 (154)
记党风剧社	黄 玮 (158)
附：《贵阳文史资料选辑》第十六—二十二辑目录 ..	(163)
编 后	(176)

抗战时期贵阳文艺活动片断

黄 炜

一、“牛鼻子”与《漫画贵阳》

黄尧是抗日战争中期到贵阳来的著名漫画家之一。1943年，通过贵阳画家吴夔的介绍，我认识了黄尧。那个时期到贵州来的漫画家还有叶浅予、丰子恺等，叶浅予喜欢到贵州外县进行采风，画了一些反映少数民族风情的漫画。黄尧则在贵阳的时间居多，他是一个很有风趣的文化人。当时不过三十岁出头，圆脸上架着轻度的近视眼镜，不管天晴下雨，不论酷暑严冬，他总穿着一件风衣，一个塞满画具、画本的皮包，从不离手。讲话总带着微笑，他是“下江人”，但总是学着讲“贵阳话”。

在贵阳居住一段时期后，黄尧对这古老的山城，抗战大后方的重镇——贵阳产生了感情，于是他每天走街串巷，东张西望地寻觅可以作画的镜头。有时我这“老贵阳”就成了他的向导和解说员。他想出版一本《漫画贵阳》，我当然赞成。而且告诉他，从前有邹一桂曾经画过贵阳的景色，时人桂百铸先生也有画卷描绘贵阳，但均为国画，而且是山水画，若以漫画成册的你算是创举了。

黄尧的《漫画贵阳》是以贵阳风光为主。如有一次我们到理发店去，看见那种用纸板做成的纸风扇，他很感兴趣。因为

那时电风扇在贵阳还是稀世之物，一些饮食店、理发店便用一块纸板悬挂于店中，加以长绳，由人来拉动。纸板前后摆动，阵阵清风徐徐而来，凉风满堂，顾客热汗顿消。他非常满意这种“土风扇”，便立即画下这一饶有风趣的山城即景。又如四十年代，贵阳公共汽车还未盛行，而以马车代步。城内马车穿市，到花溪览胜也是乘坐马车。黄尧也画下了这一情景。诸如此类的街头风光他都一一入画，后来选印时，则又以其他城市没有或少见而独具贵阳特色的编入《漫画贵阳》。

谁都知道黄尧是以创画“牛鼻子”这个人物形象而出名的。正如叶浅予所画的“王先生”、张乐平所画的“三毛”一样，读者一看就能认出。所以，一些熟人直呼黄尧为“牛鼻子”。有人建议他将《漫画贵阳》的书名改为《牛鼻子漫游贵阳》，后未采纳。这本画册，是由文通书局印行的，三十二开本。由于当时纸张困难，纸的质量很差。但出版后，仍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当时贵阳市政府出版的《贵阳市政》月刊，还著文评介。从一定的意义上说，黄尧的《漫画贵阳》生动地反映了在抗日战争时期贵阳的风貌，也是在四十年代集中描绘贵阳风光的唯一的一本画册。

黄尧在贵阳除出版《漫画贵阳》外，后来还精心画了颇为别致的《百寿图》，也是文通书局印行的。《百寿图》画的是一百个形态各异的老寿星，在每个老寿星之上，又写了形体不同的一百个“寿”字，分印在四张立幅上，合起来悬挂就是一堂小小的寿屏。

二、抗日战争时期中《贵州日报》点滴

曾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工作过的陈廉贞同志在与笔者通信当

中，谈到当时《贵州日报》的一些情况，鉴于当时参加的老报人已经不多，陈廉贞同志所谈有些鲜为人知，把这些点滴加以整理，也算是对贵阳文艺活动的“拾遗补缺”吧。

陈廉贞是一位思想进步的老报人，抗战初期编写了《抗战进入第二阶段》一书，反映当时各党各派对抗日的主张。这本书由独立出版社出版，很受欢迎。武汉失守后，陈到了贵阳。时间是四十年代初期。

当时吴鼎昌任贵州省政府主席，《贵州日报》社社长是由省政府委员严慎予兼任。吴鼎昌和严慎予都是办报的老手，吴早年曾是《大公报》领导人员之一，能诗能文。他办《贵州日报》的态度仍是《大公报》的态度，即对国民党“小骂大帮忙”。他们在用人上是以才为主，对有左倾思想的知识分子，也一起延揽。陈廉贞到了贵阳以后，严慎予正是《贵州日报》前身《革命日报》的社长，便慕名延请陈为第三版主编兼写社论，有时文章署严慎予之名，实则出自陈的手笔。

当时《贵州日报》的第三版专载贵州地方新闻，特别注重吴鼎昌在黔的方针大计，陈廉贞能作为该版的主编，足见他们是以才为主的。与此同时，《贵州日报》还聘请了思想比较进步的金慎夫、郑永欣为编辑。所以，那一时期的《贵州日报》在版面、标题、文章各方面都获得读者的好评。

《贵州日报》当时的主笔是杜阜民，贵州大方县人。虽是国民党人，但为人忠厚老实，严慎予要他任主笔，一方面对国民党省党部可以交待，总是国民党的人主持笔政，一方面由于杜对政治立场无所谓，便可容纳一些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。

《贵州日报》那时成立了一个社会福利部（据曾在《贵州日报》工作过的刘健同志回忆名叫“读者服务部”），除了搞一

些社会服务工作（如职业介绍、婚姻介绍、主办集体结婚等）外，还为读者介绍书刊。陈廉贞当时曾介绍瞿秋白同志的《海上述林》给贵州读者。陈在《贵州日报》时还编纂了《吴梅全集》，由文通书局出版，对文化事业作了一些奉献。

在抗日战争后期，日军兵抵独山的“黔南事变”时，人心惶惶，陈廉贞在《贵州日报》发表了一篇题为《磁铁战术的诠释》的文章。所谓“磁铁战术”，是国民党在长沙大火后，依然采取不抵抗主义，让日寇南进的漂亮口号。陈为了安定人心，使贵阳不致溃散，写出了《诠释》，使广大人民洞悉其中“奥秘”，揭露掩饰着的真象。这篇文章发表后，很受欢迎。而《贵州日报》是地方政府的机关报，能刊发这篇文章，也就说明在《贵州日报》中，也有维护民族尊严，激发爱国热情的工作人员。陈说，当时写这篇文章“乃是一有良心的新闻记者的天职”。《大公报》主笔张季鸾到贵阳时，还曾去专访陈廉贞，赞赏这篇文章。

三、昙花一现的《火柴头画报》

1941年，贵阳出版了一张四开的画报，名为《火柴头画报》，那时与这张画报并美的是著名漫画家高马得主编的《国民画报》。这便是抗日战争中期贵阳出版的两张画报，均是黑白色的。

《火柴头画报》的主办人是区锦汉，广东人。我曾去拜访过他，原以为是儒雅文士，却原来是一位身着武装的国民党军官。我问他为什么要叫“火柴头”呢？他说：“火柴头的意思就是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。我们这个小小的画报，也就是要在这抗战时期为抗日宣传发一分光。”区锦汉虽是一个军人，但

喜欢漫画、宣传画。他有一个侄儿，是搞木刻的，《火柴头画报》多是他们叔侄的作品。区锦汉还告诉我，准备办一个“火柴头出版社”，编辑发行一些宣传抗战的作品，不只限于图画。可是，距离我们谈话不到一个月，区锦汉被任命为师管区的团长，忙于军务，《火柴头画报》无暇兼顾，大约出版不到十期，就停刊了。“火柴头出版社”，自然也没有成立。

四、激励人心的街头音乐会

抗日战争时期，贵阳的音乐活动蓬勃开展，特别是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，大、中学生和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所开展的群众性音乐活动更为活跃。其中至今令人难忘的是“街头音乐会”（当时并没有这个名称，是笔者现加的）。

街头音乐会都是在几条主要大街闹市举行的。如大十字、中华南路、小十字、南门口等行人最多的处所。在抗日救亡的热潮中，街头音乐会没有预先宣传的海报，也没有乐队、乐器进行伴奏，更不分前台、后台。只要有一张方桌就行。指挥者就站在方桌上指挥，演出者多是学生歌咏队。人数不多，一般二十人左右。先是由这个歌咏小分队的青年学生，高唱抗战歌曲，接着人民群众围了一圈又一圈，指挥者跳上方桌，先指挥群众唱几首熟悉的抗战歌曲，如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大刀进行曲》等，然后指挥者才热情地问：“我们今天唱一首新歌好不好？”“好！”才开始教唱新歌曲。

当时所教唱的新歌都是易教易会的，如一首用外国民歌曲子配词的：“打倒日本，打倒日本，锄汉奸，锄汉奸。大家武装起来，大家武装起来，救中国，救中国！”这首歌曲，一经街头音乐会教唱后，很快就传开了。

街头音乐会所教的抗战歌曲，有的还具有浓郁的贵阳地方特色。其中有一首流行较广，印象极为刻深的，歌词是：“北平南京都失了！同胞们，快努力。”中间插入两句地地道道贵阳话的对白：“喂！老乡！亡国奴当不得嘞！”“是的嘞！”接着才唱“亡国奴当不得，依呀嗨！”这首词曲简炼明快、生动活泼、是群众易唱易学的抗战歌曲，不到二十分钟聚集在街头的千百个男女老幼都会唱了。几天以后，贵阳的学校、社会团体、街头巷尾都可以听到“亡国奴当不得，依呀嗨！”的歌声。到底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，词曲作者是谁？都不知道。有人说可能是歌咏宣传队“现编的”。这种街头音乐会与街头剧（如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等），同样受到群众的欢迎。

五、不可忽视的民间文艺

抗日战争时期贵阳的民间文艺也起了一些变化，如茶馆里的山歌、外省流入的“文明戏”，都与抗战有关。不过，这些民间文艺在当时一般中、上层人士，则认为是“下里巴人”性质的东西，很少有人去问津。

贵阳的茶馆，也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等，我这里所说的是第三等，也即是当时劳动人民憩息喝茶的“下等”茶馆，集中在世杰花园（今延安中路）、公园北路一带。这种茶馆的文娱活动，有说书和唱歌两种。说评书一般内容多是传统旧书，如《施公案》、《七侠五义》等，唱歌的又以民间小调为主，如《烟花告状》、《孟姜女寻夫》等，内容俚俗。但一些茶馆也有唱山歌的，有女声单唱和男女对唱，原来的内容多是以爱情为中心。在抗战期中，贵阳的报上曾刊发过内容以宣传抗日为中心的山歌歌词，一些唱山歌的茶馆曾演唱过，虽不是天天演

唱，但也说明民间文艺在抗战时期中也起了变化，不是老一套。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歌曲，后来有些学生到农村去作抗日宣传时，也曾采用过，效果很好。

抗战期中，贵阳的话剧演出很是频繁。排练认真，演员阵容整齐的话剧团（社）不少，如骆驼剧社、民教剧团、青年剧社和贵大剧团等。演出的话剧，多是名家所写的剧本，如曹禺的《雷雨》、沈浮的《重庆二十四小时》、高尔基的《夜店》等。导演是罗军、麦放明等名家，观众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、大中学生，可以说是很正规的。

文明戏是一般上、中层人士看不起的。它的观众也多属于劳动人民、商店人员，它的特点是台词通俗，故事曲折、噱头多，演出的条件也很简单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文明戏随着外省人来到贵阳，我和搞话剧的龚巽曾去观光过几次，颇感兴趣。

我们去过几家，格调都是差不多的。那时，生意最好的要算在中华南路达德学校内的一家。因避免日机轰炸，达德学校迁往郊区，学校的房屋部分出租。这家文明戏的剧场便在黑神庙后院上的一排教室内，把隔墙拆掉，就成了一个可容纳二百多人的剧场。座位是长条木凳，谈不上什么灯光、布景，道具也极简陋。这家剧社叫什么名称已记不起，上台的演员不过十人。据龚巽告诉我，这些演员都是“多面角色”，根据剧情的需要，可以演老年、中年、青年，甚至男扮女、女扮男，全凭化装、服装来变化。龚巽说：文明戏是没有剧本的，演员用不着背台词，不识字的都可当演员。只是在演出前，由导演“说戏”，把整个的剧情告诉演员，台词由演员根据剧情去自编，只要不出“格”就行。

文明戏虽无剧本，但却有一张“幕表”，我们曾到后台去

看过，一张大纸上写着剧名，下面便是场序和演员及剧中人姓名。“幕表”张贴在出台的门边，导演便坐在“幕表”旁，手中拿着一根“教鞭”，他真是“眼观四向，耳听八方”，既要隔着门帘听台上剧情的发展，又要看着幕表，喊着：“××上”，“××快穿衣服”，“××不要忘记带眼镜！”……，就这样全神贯注一直到演出结束。

当时正规话剧演出都要讲“国语”（即普通话），文明戏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。演员多是江浙一带的人，演戏时虽然不讲“依”、“阿拉”，但江浙口音仍听得出，有时也学讲一二句贵阳话如“的的个”、“老者神”之类，引起观众一笑。他们的服装也是“古今中外，无所不包”，有现代的西装、中山装，也有旗袍、裙子、父母装，不过都很陈旧。

文明戏的主要内容，是以社会问题为主，家庭、婚姻事件为中心。剧情内容多取材于“言情小说”，或是其中的一个片断。但有一点是很重要的，那就是故事有头有尾，文明戏很少演连续戏，因为他们“剧本”的来源是感到很枯竭的，有时多亏导演好本事，除在言情小说中去挖掘外，当时报刊杂志上所刊登的“社会新闻”，也帮了他的大忙。

有一次我和龚巽去看剧，演出的内容是讲一个“抗战夫人”被欺骗与被遗弃的悲剧，演得很逼真。一些观众非常同情这位被欺骗的女性，憎恨那位发国难财、玩弄女性的奸商。诸如此类与抗战有关的题材，在贵阳演出的文明戏中逐渐增多。因为这些故事具有现实性，而且就发生在自己的周围，于是卖座不衰。这类文明戏对抗日宣传，揭露社会阴暗面，颂赞为抗战尽力的正面人物，也起了一定的作用。特别是那些逃亡到贵阳来过着极为艰苦生活的演员们，他（她）们白天为生活

奔忙，受到人们的歧视，但仍坚持着夜夜演出，是颇令人敬佩的。我认为，叙述抗日战争中的民间文化时，不应该把他们遗忘。可惜至今我尽力回忆，也只记得起在贵阳演文明戏的演员中有两人，一个叫马一笑，一个叫徐哈哈。徐哈哈为生活所迫，白天还要兼在街头唱卖梨膏糖。

六、“电影皇后”胡蝶为阿嘛相馆题字

“电影皇后”胡蝶，曾在四十年代到过贵阳，住在贵阳招待所（即现今科学路），那是当年贵阳比较高级的宾馆。胡蝶虽非达官要人，而是名噪一时的影后，山城的影迷们都要想去一睹芳颜，据说是去的多，见面的少。这位电影皇后在贵阳留下什么呢？如果“老贵阳”不健忘的话，还应该记得在现今中华南路的阿嘛相馆的门面，临街的横壁上有“阿嘛相馆”四字，下款署“胡蝶”二字。字体方整，有点类似现在的“新魏碑体”。这块招牌曾轰动一时。因为，题写招牌一般都是书法家或权贵名人，电影皇后题写招牌，确是新闻，一时前往观赏者不少。

当时我很怀疑，胡蝶是否能写招牌，或是由人代书借用其大名。后来我曾问过阿嘛相馆的创业者彭氏兄弟，据彭晓珍和彭万里说，那是胡蝶拍摄《建国之路》电影时，路过贵阳，彭千里为了抢下这位“皇后”在抗日战争中小憩贵阳的镜头，便去给她拍照。千里将照片送去，胡蝶赞不绝口，原认为贵阳这小地方，拍不出好照片，结果她却感到技艺超群，非常满意。高兴之余，便应请为阿嘛题字，就在笔记本上用钢笔写下“阿嘛照相·胡蝶”六个字。由于字体过小，彭氏兄弟乃精心放大，做成招牌，一直保存到解放前夕。

七、“荒江女侠”夜宿三元宫

抗日战争时期到过贵阳的知名艺术界人士是不少的。历年以来多有追忆文章。而知名度不高的却无人提及。如“荒江女侠”徐琴芳和她的妹妹路明（也是电影演员）逃难到贵阳，知道的人并不多。

徐琴芳以演《荒江女侠》而出名，一般喜欢看武侠片的观众对她是很熟悉的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她和路明辗转逃难到贵阳，大约是一九四三年的夏末，我和党风剧社的黄时烽一道去看望她们。她们住在大西门社会服务处旅社，此地原是贵阳风景秀丽的“三元宫”。

那天晚上我们去的时候，已是晚上八点，徐琴芳姊妹住在进门的一间平房，屋里堆满了行李，非常零乱，拥挤不堪。屋里屋外堆满了人，徐氏姊妹只好站在人群中，状颇疲惫。她们的穿着均极为普通，面容都很憔悴。如果不是社会服务处主任张其清的介绍，我几乎不相信那就是在银幕上飞檐走壁、武功绝妙的“荒江女侠”徐琴芳与“小鸟依人”的路明。由于人多嘴杂，我们根本没有谈什么，只是寒暄几句。

虽是夜晚，但前来观看徐氏姊妹的影迷仍是不少。其中少数影迷却不顾她们的处境、心情、疲劳程度，还提出请徐琴芳唱京剧片断，请路明唱流行歌曲的要求，结果都被婉言谢绝了。听说过了几天，在社会服务处组织的一次晚会上，徐氏姊妹应邀唱戏唱歌，满足了影迷们的要求。不久，她们就离开了“三元宫”。

八、盲人歌唱家郑隐飞

抗日战争期中，贵阳的音乐活动颇为频繁，经常有演唱

会。当时知名的音乐家应尚能等，也来贵阳开过演唱会，博得掌声最多的，是他自己所作的《拉纤行》。在贵阳任省艺术馆馆长的马思聪，他的小提琴演奏会，堪称盛况空前。在音乐活动中，除掉已记下的大事和音乐界较有名气的人士外，有一位长期留在贵阳的郑隐飞，至今还有人记得起这位盲人歌唱家。

郑隐飞是外省人，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前都在贵州广播电台工作。那时广播电台设在文笔街华家阁楼内（即现在的市文化局），郑单身一人住在电台内。

在四十年代，贵阳的街头，人们经常可以看见一位留着长发，长年戴着黑色眼镜，身上穿着旧西装，一只手拉着一条套有小狗的绳子、有时由一个少年在身旁伴行的中年人，他就是郑隐飞。用当时的眼光来看，他的形象和打扮是“文化人”、

“艺术家”。据内行说，郑的歌喉不能算是“正规”的。但在我和他的接触交往中，总觉得他唱起歌来是那么热情奔放，而且他没有什么架子，没有乐器伴奏，他照样唱；没有舞台，站在人群中，他照样唱，无论谁邀请他，他都唱。

抗战胜利前夕，安顺一些文化团体，邀请郑隐飞去演唱，因我曾任过安顺“血花剧社”总干事，便要我陪他去。那次，我给他当了向导。安顺爱好音乐的青年在一个晚上，热烈地欢迎了他。记得是在一个广场，大家席地而坐围成一圈，郑站在当中，满怀激情地唱了十几首抗战歌曲。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连唱了两遍贺绿汀的《嘉陵江上》，也唱了赵元任的《教我如何不想他》。

盲人歌唱家郑隐飞平常读谱，练歌都比别人艰苦，但他总是孜孜不倦地学习。有一次他要我陪他去看电影，我很奇怪，

（下转17页）

我在民教馆的回忆

伍静远

1939年秋，我由黔西中学调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任馆长。民教馆有工作人员十三、四人，分别设有文化、艺术、体育、总务四个组；另外，还有一个电影放映队。各组均设有主任一人，工作员一至二人。

在我任职期间，民教馆工作较为活跃。体育方面，组织有星期篮球赛，这是在我未来以前就有的一项活动。参加比赛的贵阳有几个队，驻都匀的汽车辎重兵学校每周都专车派球员来贵阳参加比赛。担任裁判工作的是体育组主任杨纯福，杨系南京中央大学体育系毕业，经验较为丰富，颇受欢迎。当时，贵阳文体活动较少，球赛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，每逢星期天，观看球赛的人挤满了球场，极一时之盛。夜间，在广场上有打金钱板的，歌词大多是文化组一位姓曲的艺人新编的。自编自唱，唱词新颖，寓教育于娱乐之中，深得好评。电影放映组的负责人是张文海，每周定期免费放映三次，影片都是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，每次吸引观众不少。文化组还办得有民众夜校，有两个班，以学文化为主，参加学习的妇女不少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不少从事文艺工作的人逃难来贵阳，而贵阳当时又没有话剧团的组织，于是民教馆出面组织“民教剧团”，由我任团长。参加这个团的有：韦布（馆内艺术组主

任，担任导演），程漠、汪季子、王侯、麦放明、金罗伦等。经费来源主要靠募捐和售票收入来维持。先后演出过《魔窟》、《寄生草》等剧，受到观众好评，每场座无虚席。为了便于演出，我们还特请教育厅拨专款将原来的礼堂改建成斜坡式剧场，增加了设备，这个场子当时在贵阳就算是较为理想的了。后来这个剧团因一部分人离开贵阳，同时，三民主义青年团又出面组织“青年剧社”，由贵阳中央日报社社长王亚明兼任社长。当时在贵阳演话剧的并不多，他们提出要“民教剧团”与它合并，我坚决不同意，终因成员过少，经费无着而瓦解了。

我在职近一年，1940年夏因教育厅长张志韩去职，我也就离开了。

（上接78页）

刘子东——曾是资委会运务处职员，演过《刑》、《野玫瑰》、《国家至上》、《原野》等戏，长于饰演反面角色，演出时常用“刘浪”艺名。

刘平——演过《梅梦香》主角，并参加《少奶奶的扇子》《鸡鸣早看天》、《小人物狂想曲》等剧演出，当时年仅十九岁。

蔡琪——“重庆剧专”学生，演过《少奶奶的扇子》等角。

画家热心业余戏剧的有：

朱克可——曾是“铁血剧团”成员，他常搞舞美设计的工作，如《烟》剧舞台美术设计和负责宣传。

高马得——当年和戏剧界朋友时相往来，为大家作漫画。他就是过去上海《新民报》常发表漫画的画家，现在南京。我尚存有他为我画的一幅漫画。

抗战时期贵阳的文艺活动点滴

钱安毅

“七七”抗战之前，贵阳虽是一个省会，但交通闭塞，文艺活动十分沉寂。抗战发生以后，贵阳成了西南大后方的重镇之一；条件变化，贵阳文艺活动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气氛。只是有些活动，零星片段，难期一件不漏地加以罗列。

本文先以两个机构为中心，从而写明其有关的活动；然后就力所能及、涉及当时一些零星片段的事实。

一、贵州艺术馆及其有关的活动

贵州艺术馆于1943年成立。自此以后，贵州艺术界的人以及他们进行艺术方面的活动，都有了自己的“家”。抗战当中，物力艰难，当时能够建立二层楼房，也可算得不容易。艺术馆成立之初，业务尚未开展，仅着重于古名贵字画与其他文物之收藏；工作逐步开展之后，音乐厅、书画展览等，都多起来了。我记得的，就有小提琴名手马思聪的小提琴独奏会，有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的独唱会。1946年，贵阳全市中学生唱歌比赛，也在这里举行，《黄河大合唱》也曾在这里演唱。可以说，自从该馆建馆以来，贵阳所有公开的音乐集会，都常在这里举行。小小的会场，已经起了“音乐厅”的作用。1949年，贵阳师范学院为“反饥饿”而举办的《长恨歌演唱会》也是在

这里举行的。

这里还不仅演奏音乐，抗战期中，舞蹈家吴晓邦也曾在这里演出，在这里举办书画展览的更多。

二、三青团的“宣（传）社（会）”活动

三青团的各级组织，都设有“宣社股”（组）各在其范围内进行文艺活动。抗战期中，工作搞得比较出色的，是贵州省团部的宣鼓组。这个宣鼓组组织有一个“青年话剧社”和一个“青年歌咏队”。青年话剧社的成员，不限于宣鼓组，公演时临时物色。麦放明就是曾经主演过好几出话剧的要角之一。该社成立于1939年，在抗战期中，该社曾演出过《日出》、《雷雨》、《雾重庆》、《杏花春雨江南》、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等，都是抗战时期受人称赞的好剧目。

三青团的大礼堂多次作过书画展。徐悲鸿的画展就是在这里举办的。

青年歌咏队以郭可淑为指挥，入队参加练唱的，都是当时贵阳的大中学生，平时每周定期练唱，到一定时间公演。平时选作练唱教材的，取材相当广泛，如《松花江上》、《黄河大合唱》、《大刀进行曲》、《旗正飘飘》、《毕业歌》、《大路歌》、《燕子啊你来自北方》等。

三青团贵阳市团部的文艺活动，大部分以各学校为主要对象。他们多是在自己校里组织唱歌、绘画、演“活报剧”等，有时也组织校际的活动。

三、电 影

抗战期中，在贵阳，接触群众面最大的，要算电影，男女